

周春芽:对当代艺术市场不应幸灾乐祸

记者:您认为金融危机对艺术的影响大吗?

周春芽:由于艺术也是一种奢侈品,所以金融危机对艺术的影响最大。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是坏事,反而能令艺术家受到的干扰少一些,能够潜心创作作品。我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该创作的时候创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记者:听说您最近在上海盖了一间工作室?

周春芽:对,上海这个工作室面积比较大,约有1700平米左右。三面环水,还有4亩桃园,整体风格中西合璧,由近代建筑大师童隼的孙子童明设计,他也是去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的参加者。建成后我还打算成立周春芽艺术研究所,除了自己的创作外还将投入一些项目资金来赞助支持年轻艺术家,以及帮助一些社会上的残疾人来学艺术。在成都我还有一个工作室,也刚刚装修完毕,面积约700平方米,是蓝顶14位艺术家群体工作室中的一间,1月12号举行入驻仪式。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而不是艺术集中的北京盖工作室?

周春芽:我是半个上海人,我对江南有情节,我的桃花系列就有江南风韵。从创作角度,上海更有这样的意境。艺术家没有必要都集中在北京,要选择适合自己作品风格的地方进行创作,要有自己独特和具有个性的生活方式。

记者:今年您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比如在5·12大地震时作为发起人之一发起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赈灾义拍,自己又向残疾人直接捐助30万人民币,之后又频繁出现在一些慈善活动现场中。社会职责是否占用了您的大部分精力,创作作品的时间受到一些影响?

周春芽:我今年的确画得不是很多,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很有意思,当代艺术家就是要关注身边的事情。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创作有所激励。我现在还准备做一个流动学校帮助残疾



周春芽《只开花不结果》

人学习艺术。另外还赞助了一个纪录片《明天》,1月12号首映。这些活动并没有影响我的创作,同时我的灵感也不完全来自这些社会活动。因为艺术家要在精神上反映所发生的事情,让人们更加热爱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赤裸裸地将灾难表现出来,我觉得灾区的人拿到经济的资助比得到一幅画着灾难的艺术品更实惠。

记者:您怎么看待今年当代艺术的暴跌行情?

周春芽:中国当代艺术现在非常好,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能够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很不容易。同时,今年的暴跌要从大局来看。国外连银行都垮了还能不波及到艺术领域?因此,在大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人们更不应应对艺术市场的低迷幸灾乐祸。如果大家团结努力,能够挺过最困

难的时期,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希望世界上的艺术大师有中国人,非常高的艺术价位也有中国人,哪怕不是我也无所谓。1989年我从德国留学回来是作好了牺牲我们这一代艺术家,但也要努力奋斗让下一代中国艺术家在世界上有尊严有面子。

记者:您的创作会在明年有哪些突破?

周春芽:我感觉以前的绿狗和桃花系列还没有画完,还能有更好的发挥。比如绿狗系列我会加入一些其它环境进去。不过明年会有新题材的推出,目前正在酝酿思考当中。成功后,可能将会在明年后半年推出。另外,后年我还打算推出自己的个展,准备做一个回顾展和一个新作展。除了架上绘画,雕塑也是我目前正在创作的项目,不过装置还没有涉及,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感觉。



周春芽近影

岳敏君:这个很复杂,我也没有想过。中国的传统教育都是线性的。理解一个艺术家都是前后逻辑比较明确,变化也在一条线上。公众认为艺术家创作应该在一个脉络上,应该越来越好。比如原来画两只眼睛,明年就要画三个,过几年或许画四个,在递增或者递减中变化,是一种量化的线性方式。而我不是跳跃向前发展,可能会分叉。因为我觉得艺术不是一个进步的概念,对于个体艺术家来说仅仅是在某个空间范围内的创作。

记者:您觉得目前藏家群体对您的迷宫系列有多少认识?

岳敏君:不知道,我画这个题材的时间比较短,从2005年开始。我也不揣摩他们的感觉,只是凭自己的感受画。如果我要时刻考虑藏家怎么想,追求这些就虚无缥缈了,毕竟我不是他们肚子上的蛔虫。

记者:那您的“笑脸”系列还能走多远?

岳敏君:“笑脸”肯定要继续画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作品中“笑脸”人物就是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可以在未来任何一个画面出现,只要你转换背景,内容就可以了。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背景也会转换。通常人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都处在两个背景下,一个是作品内人物的背

景,另一个是观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背景。所以两个背景的结合下,有的时候一张作品根本就没有变过,比如200年前的画,为什么后来的人觉得它表现出和200年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是因为观众的现实背景已经转换了,知识系统也转换了。因此追求“变”和“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问题。而现在所谓的“变”其实是受商业思维的影响。商业最根本的是要求“变”。比如服装、手机、电视每一年要改换一下外观。但艺术不是商业,不能因为商业中的“审美疲劳”而频频改变。整个社会也不应该用“变”来判断艺术,否则就是商业企图。

记者:但是也有人认为您的“笑脸”系列已经令人“审美疲劳”。

岳敏君:中国人每个老百姓都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一旦知道权利在哪,就会随意批判任何东西。虽然有时不负责任。但是这样的批评两面性很强,需要批评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不需要的时候又随便乱说。

记者:您的《教皇》、《处决》等作品打破了个人世界拍卖成交纪录,这些带着暴力元素的作品是否体现着一些生活本质?

岳敏君:这样的作品来源我所受的教育,是过去的某些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东西。《处决》实

际严格意义上戈雅画过,马奈也根据戈雅作品画过,戈雅当时是描写政府如何处理一些对立面的人。后来毕加索也根据两人作品画过这样的系列。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局限在一种很具体的事件本身,有很强的对错位场。但是我的作品最关键的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哪怕面对枪都是笑的,而刽子手手中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枪,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些问题。

记者:我们刊物自春拍以来推出艺术家作品流拍榜,受到较大关注。您认为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更惧怕流拍?

岳敏君:只能说明拍卖市场存在问题。流拍会影响拍卖行,也影响送拍的人,以致影响到整个市场。而另一方面媒体为什么要出“流拍榜”,而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这说明社会真实的状况。人人口头都说钱不重要,但是每个人内心对价格高低很在乎。所以,每天报纸上都是和钱的数字相关的内容,比如电影的票房,书的销量。所有的东西哪还有真实评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习惯用数字衡量任何事物。相反,如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有榜单出现,我想一定是作品的“痛苦指标榜”,“思想深度榜”等。所以以经济社会影响我们判断很多东西。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是拍卖行的中流砥柱,他们会直接从您手里拿作品吗?

岳敏君:拍卖最开始的时候有向拍卖行送过作品,那时候完全还没有市场,有点像展览,展完以后就卖。后来我看拍卖行做古董、中国画的时候,价格变化令人生疑,就很担心,再也没有送过作品到拍卖行。有些拍卖行很不规范,可以人为控制所谓的价格,有一种欺骗感,稍微有点伦理道德的人就会受不了。不过今年5·12地震后,我们也给北京保利送过作品拍卖赈灾,但是意义和普通的拍卖不同。

记者:今年奥运前由于圣火在法国遭遇抢夺,卢昊、王广义等艺术家发起取消在法国展览的活动,您也声援参加,您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今年多吗?

岳敏君: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少。因为目前的社会存在一个问题,普通人没有一个合理方式参与到所有的社会问题中去,政府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也没有渠道让公民参与,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参与什么或者怎么参与。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像此次撤展事件,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最后不像你原来想像的那么简单和纯洁。毕竟综合各方力量的显现,比如民族情绪、各种政治内涵混杂在一起就变得太复杂。而你当初想得可能很简单,像我们艺术创作的人,稍微复杂一点就蒙了。